

庄子

白话今译

先秦诸子今译丛书

李双
译注

ZHUANG ZI BAIHUA JINYI

中国书店

庄子

白话今译

先秦诸子今译丛书

李双 译注

ZHUANGZI BAIHUA JINYI

中国书店

(京)新登字 213 号

本丛书顾问:启 功 郭预衡

《庄子》白话今译

李 双 译注

*

中国书店 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印张: 16.5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65 千字 · 印数: 00 001-10 000

ISBN 7-80568-559-2/B · 80

定价:15.00 元

序

这套“先秦诸子今译”丛书，从时间上看，正赶上由《资治通鉴》白话本出版而激起的古文今译热潮。既是“潮”，那就该归为“显学”，这个名称总是不大入耳的。而且，在有的人看来，将典雅古朴的国粹糟塌成浅俗不堪的白话，无异于挖掘祖坟，粗鄙无道。只是这潮仍不可阻遏地热起来了，起码说，还有许多读者喜爱这种“下里巴人”的东西。我常想，既然老祖宗的东西各个时代都有人注，而且注得好的都成了大师，拿不大准的就多多益善地收罗先人的话充数，号称什么经“注我”；甚至自己不“注”一字，尽得风流，达到了“大美不言”的化境，不但免遭物议，反为同行相与乐道。那么，今天我们译成大白话，不妨也可以冒充成一种注罢。当然，大潮一起，免不了泛些泥沙残渣，恰如这套丛书免不了多有注译上的错讹一样；但潮落之后，大浪淘沙，或者会有精妙之作显露出来。

先秦诸子的时代，在我国历史上是读书人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最活跃、少束缚的时代，也是一个异彩纷呈、硕果累累、最为辉煌璀璨的时代。可以说，这个时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组成我们民族文化核心的儒、道、释三大思想宝库，就有两家半（因为佛教也中国化了）兴起于先秦。可惜自那以后，中国历史上就再没有重现过同样令人激动和向往的“百家争鸣”的自由壮观的局面。先有暴君秦始皇因惧惮

思想的伟力而“坑儒”，继以汉武帝为了“役心”的需要，采纳最长于给同类致命一击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百家终究只尚一家，儒家变成了儒教。更可怕的是其后近两千年，儒教与封建政体结合，形成政教合一的形态，大大方便了统治者“动口”不行就“动手”，思想“教育”不奏效就施虐于肉体。于是，创造被扼杀了，“万马齐喑”成为不争之实。今天，欣逢大力提倡“思想再解放一点”的盛世，我们着手先秦诸子白话今译的工作，也是奢望以绵薄（精神的东西毕竟不如物质的来得直捷快当，此之谓“绵”；学养太浅，无能传其精髓达其要义，此之谓“薄”）之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祖国曾有过的光辉时代，让更多的人歆享我们祖先创造的精神文明，让更多的人汲取菁华、走出蒙昧，为中华的复兴增添一分力量！

一个时期，反传统文化成为时尚。有的人动辄对传统文化大加挞伐，仿佛民国初闹革命，以为只要“咔嚓”一声将辫子剪掉，耳濡目染、浸淫五腑的封建污秽也随之而去。类似的“战斗”，从来没有成功过。“五四”时力倡“打倒孔家店”，现在不但没倒，香火还甚于从前。还有人辩护说那样做是为了“矫枉过正”，这不禁使人回忆起物质生产一“过正”就诞生“大跃进”的教训，我想精神文化的建设也不会例外。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传统”就是十全十美的（持此谬论者也大有人在）。只是，既然“传”诸后代而成为“统”，那就有它的合理性和它的生命力。传统文化固然与具体的时代和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甚至无法弄清是它在规定政治，还是政治常常要利用它；但是，传统文化绝不等同于它们，它是更趋于永恒的东西（如果不是伪文化）。一个时代结束了，一种

具体的政治体制被更进步的取代了，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精神可以增添新鲜血液，可以芟除与生俱来或在时间长河中衍生的赘物，但绝对无法结束它和取代它！退后一步说吧，来不及了解对象就挹伐所结出的果子，一定也与来不及了解对象就歌颂同样苦涩。这，也是我们译注先秦诸子的一个原因。

这套丛书，承蒙著名学者启功、郭预衡两位老先生的关心，我们深感荣幸。北师大中文系郭英德先生和北京图书馆吴龙辉博士对本丛书的组织编译做了大量工作，没有他们的努力，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丛书最后由我审定，由于学力不逮，时间紧迫，加之译注者水平不一，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可以说，这套丛书如果还有可取之处，应该归功于学界前辈的指导和学养我只能望其项背的诸位先生的辛勤劳动；而它的所有不足，则应归咎于我的才疏学浅，力不胜任。

《先秦诸子今译丛书》主编 李 双

1992年8月21日于北京

导 言

鲁迅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人们憎恨和尚，恨尼姑，恨回教徒，但就是不恨道士。懂得了道家，就懂得了中国的一半。如果鲁迅先生此话不差，那么中国几千年历史或者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人们总是拿儒、释的苦行去苛求他人，而用道家的自由来适应自己；或者，总是“肉食者”用儒、释的苦行去规范下人，用老庄的逍遥来满足自己。看来，“中国的一半”并不仅仅是中国的一半，也许，它是人类的一半。怀着对自由的渴求立身于社会，最终却迹近放荡，为世俗所不容，反而更不自由，我想这才是真庄子们的必由之路；然而千百年来的假庄子却做到了不遭人厌的洒脱，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都应当读一读《庄子》。

庄子其人，《史记》上有这样一段记述：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根据司马迁的这段话，庄子的生平大概就清楚了。他是

战国时期的著名隐士，生卒年约在前369~286年，山东曹县（一说今河南商丘）人。他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一生清贫，甚至靠编草鞋维持生活；但他博学有才，并且与王公大人等显贵不沾边。

此外，从《庄子》中的记述，我们还可以知道这样一些事情。

首先，庄子是一位善辩的人。他在文章中臆造了许多人物，借他人的口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辩论对手总是理屈辞穷。最典型的，是战国时名家代表，“白马非马”论的发明者，大狡辩家公孙龙，在庄子笔下，也只能“口呿而不合，舌举而不下”，赶紧逃走。有时候，《庄子》也直接表现庄子的辩才。他与惠施辩论时，惠施问他怎么知道水中的鱼儿很快活，他就机智地移花接木，说：“我知之濠上也。”庄子在论辩时，非常擅长巧妙取譬；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喜好捏造事实——孔子在这一点上被“捏造”得最惨，要么虔诚地否定自己，宣扬老庄，要么被庄子教训一通后恍然大悟。

其次，庄子不想当官，也不是当官的料。楚王派两位大臣去请他，客气地说：“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正在钓鱼，头都不回，反而讽刺了几句。惠施做了相当于今天总理那么大的官，庄子去看他，惠施大约自忖才德皆不及，生怕“总理”的乌纱帽丢了，暗中使坏，派人搜捕三天三夜。庄子就对惠施说：有种叫鸚鵡的鸟，“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有只猫头鹰抓了个烂老鼠，恰巧鸚鵡飞过，猫头鹰觉得应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就愤怒地“嚇”了一声。那么，你现在要用“总理”的乌纱帽“嚇”我吗？从这两件事，可见庄子之不愿为官。至于任漆园吏，恐怕是为生计所迫而

“失节”。此外，在《庄子》中，三皇五帝的伟大业绩，总是被庄子贬低，甚至认为他们的思想路线都错了。做官有两类，一是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是要为官一任，中饱私囊。庄子口口声声“无为”，显然不愿为讨众人欢心而去“造福”；又口口声声要“逍遥”，也瞧不上闻达显赫，贪图物质享受。所以说，庄子不是当官的料。

再次，庄子是一位活得很潇洒的人。他在《德充符》里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不论精神上的享受还是物质上的享受，庄子都看得很淡。他的妻子死了，他却“鼓盆而歌”，连外人都看不惯。不过，庄子的潇洒也颇有几分不潇洒。他经常讥嘲世人，把一个个历史伟人（老子除外）置于可笑的位置，指东道西免不了尖酸刻薄。如果说老子是一位真诚的智者，那么庄子就多了点玩世不恭。后世竹林七贤，就是把庄子的这方面继承太多了。

《庄子》其书，据《汉书·艺文志》载，共52篇。今仅存33篇，分成内、外、杂三部分。古今有一种传统说法，认为内篇系庄周自著，外、杂两部分为庄门弟子及后学所著。对这个结论，许多学人也提出质疑，看法颇有差异。如司马迁认为是出自庄子手笔的《渔父》、《盗跖》、《胠箧》诸篇，又属于杂、外篇中文章；又如许多人认为《庄子》分为内、外、杂三部分，是始于郭象，今人崔大华却考证为《庄子》篇目划分先是有内、外之分，汉代刘向所为；然后有从外篇中分出杂篇的划分，这是从魏晋时代司马彪开始，郭象完成的。再如，自宋代苏轼以《让王》四篇为伪书后，元、明、清各代著名学者都对全书中许多篇章提出疑问。总之，延续至今的

各种争论考证，都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庄子》究竟哪些是庄子所著，哪些非庄子所著。我们对这个问题，姑且象对待庄子生卒年那样，求大同存小异就行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言公》中说：“凡称子书，多非自著。”今人冯友兰补充解释这个观点，认为在先秦，著作人观念并不明确，更没有所谓著作权，因而许多人写一本书，每篇文章也不一定署上作者名字，这种情形几乎是习以为常。不论如何，《庄子》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在这里撇开著作权问题，而以它的基本思想为线索去分析、辨证和研究。

二

《庄子》的思想，其精髓仍然是承袭老子。但《庄子》在系统性、文学性上颇有自己的特色。我在这里不单独分出庄子，而以《庄子》这本书的思想作为阐述的基准。这是因为，将庄子和《庄子》分开，必然涉及诸多烦琐的考证，而这种考证的意义未必有多大。既然《庄子》一书在思想上有其主脉，就不会太多地影响我们对《庄子》的认识。

和《老子》一样，读《庄子》，最令人费解的就是其核心范畴“道”。“道”是《庄子》一书所表现的哲学上本体论的母概念。与之相关的，有“天”、“气”、“化”、“造物者”、“自然”等概念。有学者作过统计，《庄子》共出现过三百二十多次“道”。这些“道”的意义，有语义上的和哲学上的两大类。前者“道”的含义主要是指道路和言说。如“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寓言》），“道尧舜于戴晋人之前，譬犹一叹也。”（《则阳》）后者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是具有具体所指的道：《知北游》中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

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这个“道”，即指自然万物的固有规律和法则。《人间世》中说，“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这个“道”，是代表符合某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伦理规范。二是脱离具体内容，而具有普遍认识价值的抽象意义的道：如“学道不倦”，是指真理；“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是指道术、方法。三是代表宇宙根本的“道”。如“形非道不生。”（《天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天地》）“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天道》）等等。这个意义上的道，是《庄子》宇宙观的本质表现。也就是说，道并没有具体直观的可感性，但它又无处不在，主宰着自然和人，人是无法认知道的，而只能通过顺任自然以求不与道相违背。

为了使“道”不那么虚无神秘，《庄子》一书还用“气”和“化”的概念来表现它。“气”分阴气阳气，阴阳之气相互作用就产生万物。“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田子方》）可见，气既是虚无不可见其形的，又是构成万物的基始；万物、天地、自然、人类等有形的东西表明了气的存在和作用。而万物的存在形式，就是“化”。在先秦诸子中，《庄子》对事物运动和变化理解得相当深刻。书中提出：“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秋水》）就是说，事物的变化是固有的、永恒的。并且，事物的变化也是普遍的，“天地虽大，其化均也。”（《天地》）“万物皆化”。（《至乐》）而“化”的共同规律是：“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寓言》）《庄子》书中甚至运用并不科

学的事实去验证“化”的“始卒若环”。在《至乐》篇里，庄子勾画出这样一幅“化”的图景：由最小的“几”，“得水则为鼃，……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几）”。人的变化竟是如此地循环，虽不科学，却反映出《庄子》一书对“化”的理解：宇宙万物的“化”，不是无穷地诞生出新东西，而是相互间的转换。用今天的自然科学原理解释，那就是物质不灭。

总括起来，《庄子》这些对世界本体的认识是：整个宇宙，冥冥中存在着一个“道”（许多时候用“天”、“真宰”等观念代替）。“道”通过“气”的作用显示出来，而宇宙万物又是变化无穷，时刻在相互转化的。以这种思想为起点，《庄子》还完整地表现出其人生观、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

许多人认为《庄子》表现出的人生自由精神很不吻合统治者的心愿，因而千百年来道家被贬为异端，儒家被尊为正统。侯外庐先生却道出了一句精彩的话：“庄子的思想，从其影响于中国士大夫的历史看来，实在不是‘异端’，而是‘正统’。”（《中国思想通史》）为证明这个观点，引用了宋人叶适的话：“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那么，《庄子》的人生观究竟是什么呢？

可以这样说，《庄子》给人生从远处看赋予了浓重的悲剧色彩，而从近处看则赋予了知天安命的乐观色彩。既然有“道”高高在上，那么人生就没有永恒的东西。换句话说，人生毫无意义。所以，他才说出，“天地岂私贫我哉？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这样的话。人的努力都是徒劳，天命安排好了一切。如果人人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会发现生还不如死。

因而,《庄子》又指出了另一条道路。《德充符》中说:“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悦),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庄子》揭示人生的悲剧意义的同时,明证了个人名利、荣辱毁誉、仁义礼法、得失祸福等一切人间的“文化垃圾”,对人本身而言都是过眼烟云的东西,只有永远内心安宁和悦,不局促牵累于物质欲望,“与物为春”,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同时,《庄子》并不以人类肉体的短暂为悲哀。《田子方》篇说:“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肢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也就是说,个人的生命,以整个宇宙为依据;个体虽然会“将为尘垢”,但整体却“得其所一而同乐”,从而仍然达到永恒。所以,“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田子方》)。倘若人只知道“与接为构,日以心斗”(《齐物论》),就会“形不离而生亡”(《达生》)。可见,《庄子》一书表现出的人生观,在消极的外表下,还有其积极的本质。让人超越自己以达到永恒,不是许多古代知识分子(士大夫)所属意的“正统”吗?当然,也难免有“济其欲”者读《庄子》,不过这个责任大概不能由《庄子》来负。

与上述人生态度相应和,《庄子》形成了其独特的社会政治思想。历来有学人将这种思想称为“倒退的社会观”,其实,不能简单地用“倒退”或“进步”对其进行界定。简而言之,《庄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有这样几方面的表现。其一,从认识上的相对论出发,否定社会是非善恶的客观标准。《秋水》中这样写道:“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徒。”也就是说,对统治者,没有古今不变的善恶评定准则。“篡夫”和“义徒”的差别不

是统治者本身的差别，而是由于“时”、“俗”造成的差别。“时”、“俗”不同，篡夫也会被人们评价为义徒。其二，从“天”与“人”的关系出发，否定一切现存社会制度和伦理规范。《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央帝国有位叫混沌的帝王，因为善待了另外两位帝王，那两位就商议报答。混沌没有七窍，两位好心地为他凿成七窍，工作了七天，七窍凿成了，混沌也死了。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和自然一样，有“道”主宰着，它的变化、发展等等，都会顺应“道”而生成，完全不应以人为的努力去推进或阻碍。一切人为努力，对人类社会都是有害的。所以，“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搯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殄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搯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总而言之，从社会伦理上看的仁义礼智，从社会制度上看的先王圣法等等一切人类文明的产物，都应当弃绝。其三，《庄子》展现了其理想社会的蓝本，那就是，无君无为，返朴归真。孔子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滕文公（下）》），庄子及其后学们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孔子的“君子不党”是出于看不上“小人”，庄子们的“不党”却是出于对人本性的认识。因而，“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

所以，如果说《庄子》的社会政治观是一种倒退的思想，那这种“倒退”确有其合理性。庄子们之所以强调知天安命，

安时处顺，无为而治，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弊病——异化。与其有所为而异化到相反方面，不如无为虚静而保持淳朴。这是《庄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深刻之处。不过，《庄子》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人类文明固然有异化的弊端，但也有克服异化的法宝。以《庄子》的理想，人们在“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马蹄》）其实不然，人哪里做得到无知无欲！连动物也要为食物而争斗，为当首领而“用兵”。我常想，《庄子》认为世界万物都处于永恒的“化”之中，倘把这一思想运用到社会政治观中，坦然看待人世纷争，那岂不更妙？

三

《庄子》思想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已为学人所屡屡述及。我想冒昧地指出，《庄子》在哲学思想上的贡献，《老子》其实已经完成了主要。后人每每乐道“庄子”，大约并不是他为人人生，为宇宙观提出了更多理论上的东西，恐怕主要还是欣赏“庄子”自由与超脱的人生态度。这种自由与超脱，既是人必不可少的失意之时的慰安，也是人作为个体存在必不可少的肯定自我的良药。一个人如果无法“兼济天下”，那他对“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必定颇感兴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许多士大夫阶层的人尊崇老庄，即便在今天，或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骂孔孟的人多，贬老庄的人少。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个体与类的存在的矛盾关系的反映。人的存在，自由当然是其本质。但自由不是绝对的，为了保证这个自由，就需要类的存在。也就是说，需要社会的扶助，也需要社会的限制。统治者，往往是类的存在需要的最高表现。所以，“在野”者高张“庄子”，“执政”者高张孔孟。生生世

世，“在野”的人多，“执政”的人少，老庄就当然地少挨许多骂，而孔孟也当然地应当挨骂。鲁迅评价某些人“一阔脸就变”，除了他个人的品质坏，大约也颇有“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的因素。也许，这也是中国人不恨（或少恨）道士的缘故罢。

公认《庄子》对浪漫主义文学影响深远，不论是脱俗超凡的构思，波谲云诡的文风，还是奇特神异的形象。这恰好也印证了我上述所言，因为文学尤其注重自由心灵，古往今来，御用或“歌德”的作品，少有不被历史淘汰的。

那么，我们评价《庄子》，就应当有一个求真的态度。以前将“老庄”庸俗而简单地等同于消极怠世，无所可取；今天又反过来，唯老庄是善，而孔孟就不值一哂，都是有失公允的。

这本《白话今译》，以郭庆藩《庄子集释》为底本，参照了若干古今研究成果。由于是普及性读物，许多细微处存在语焉不详的毛病，一方面是因为我学识浅陋，另一方面也由于考虑到读者对象，故意有所简略。在译注过程中，张忆女士给予了至关重要的帮助，东方少、刘楚、季迪、彭恒军等诸君做了许多资料收集工作，中国书店出版社马建农先生也热情扶持，我的感激之情是难以言表的。

李 双

1993年8月于北京阜外大街
花园村2号乌有斋

目 录

内 篇

逍遥游	(3)
齐物论	(16)
养生主	(41)
人间世	(47)
德充符	(70)
大宗师	(84)
应帝王	(106)

外 篇

骈拇	(117)
马蹄	(126)
胠箠	(131)
在宥	(142)
天地	(158)
天道	(180)
天运	(195)
刻意	(212)
缮性	(217)
秋水	(222)
至乐	(241)